

告別戰爭，或告別革命？：

評《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

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汪宏倫主編，台北：聯經，2014年，ix+633頁。

十分榮幸受邀為汪宏倫教授（以下敬稱皆省略）主編的《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撰寫書評。本書是台灣（甚至華語世界）第一本全面論述「戰爭與社會」各層次關係的專著，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如汪宏倫(2014a: 15-17)在其精彩的〈導論〉所言，本書涵蓋「理論與宏觀歷史」、「對戰爭期間與戰爭狀態的具體分析」、「戰爭的倫理問題」、「微觀或個體的層次」四個面向，內容極為豐富。我的學力及書評的篇幅皆有限，難以逐一討論本書觸及的大量課題，因此，筆者只能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出發，針對幾個問題略做引申，權充此書的註腳。

首先，談談汪宏倫(2014b)及朱元鴻(2014)都討論到的問題：二十世紀革命史中的戰爭與暴力。汪宏倫(2014b: 191)在論述當代中國的「戰爭之框」時指出，毛澤東繼承了俄共的「戰爭共產主義」，強調「槍桿子出政權」，因此「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可說是建立在武裝抗爭與軍事戰鬥上，而其思想源頭，可追溯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建立的階級鬥爭與列寧式的革命路線上」。暴力也理所當然成為新中國「國家本質的一部份」。

相較於汪宏倫，朱元鴻的野心則更為龐大。他試圖耙梳、重建整個二十世紀的革命與戰爭史，並提出下列命題：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強調武裝鬥爭、暴力革命的「戰爭共產主義」正逐漸讓位給非暴

力的、以橫向網絡為基礎的「公民抵抗」(civil resistance)。在這個命題背後，是大量歷史資訊的交錯堆疊，從俄國革命及內戰，到亞洲、拉美、非洲的解放運動，再一路開展到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墨西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簡稱 EZLN)、義大利的「白衫黨」(Tute Bianche)，乃至 2011 年以降的阿拉伯之春等。朱元鴻從蕪雜的歷史中梳理出一條「從戰爭共產主義到公民抵抗」的敘事軸線，視野恢弘，令人嘆服。但這種或多或少線性的敘事結構，卻讓我隱約感到不安。其中一條敘事軸線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武裝鬥爭、政變、內戰
→ 一黨獨裁（起義者成為鎮壓者）

借用朱元鴻(2014: 123)自己的說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為武裝奪權與軍政府一黨統治提供正當化的標語，也是武裝鬥爭能夠具體獲致成功的模式」。我不否認這種理解方式確實反映了一部份的現實，但我更在意的是歷史的複雜樣貌恐怕有遭抹平的危險。沒有錯，任何歷史敘事都必須與複雜性搏鬥，合理範圍內的「削足適履」恐怕也難以避免。但重點是：這種敘事結構所排除掉的歷史向度具有深厚的理論意涵，而任何人若要持平地理解二十世紀革命史的成就與限制，甚至以此為基礎來重新理解既有的「戰爭之框」，都不該忽略這些歷史向度。

首先，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武裝鬥爭？汪宏倫和朱元鴻的文章提供的線索，似乎是把兩者等同起來，且進一步推論：這種窮兵黷武的武裝鬥爭造就了「戰爭共產主義」，而「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75 年後的越南，以及波帕的赤柬政權」的獨裁統治、血腥鎮壓都只是這種鬥爭邏輯的延伸（朱元鴻 2014: 125）。

某種程度上，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這恰恰是許多反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對中共政權的批評。事實上，如果回歸古典

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我們會發現「儘管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假定社會主義革命必然牽涉暴力手段……但是，認為革命可以仰賴軍隊而實現的概念，則遠超乎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想像」（Meisner 2012: 108）。1927年中共第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所謂的「清黨」）後，毛澤東開始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並武裝農民，且在1933年之後完全脫離都市。但中共的武裝革命路線，是在史達林極左的「第三時期」理論規定的戰略下進行的，故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井岡山的鬥爭〉中說：「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毛澤東 1991a: 77, 79）。正因為中共過度依賴武裝鬥爭，使得「黨變成包辦代替工人階級的革命歷史任務的工具，以打江山和維護黨天下為最高目標」（向青 2009: 225），也因此，新中國「從頭起就帶有嚴重的變態，就是官僚專制，一直不肯把最高權力交給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這是模仿墮落後的蘇聯的結果，也是長期主要依靠軍隊的結果」（向青 1997: 348）。

至於把毛澤東的武裝鬥爭追溯至列寧，也大有疑問。對列寧來說，武裝鬥爭只是「受特殊規律支配的一種特殊的政治鬥爭形式」（Lenin, 1995b: 328），他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把武裝鬥爭提升到放諸四海皆準的層次。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前四個月，列寧還肯定俄國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因為從1917年2月至7月這段期間，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實質上分掌了政權（王凡西 2003: 98-99）。毛澤東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他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中說得很清楚：

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

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在這裡，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毛澤東 1991b: 542-543，底線為筆者所加）。

事實上，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是「一個真正的都市群眾黨，一個合法的民主政黨，由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歧異的意識型態立場組成」（Lewin 1985: 199），這跟走「武裝割據、持久戰爭、槍桿子打天下」（王凡西 2003: 89）路線的中共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再看看托洛茨基怎麼看待軍隊：「軍隊乃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一切病症在它身上都會出現，而且通常還發作得更厲害些。戰爭本是嚴肅的事情，不容許幻想和抄襲。軍隊需要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Trotsky 2008a: 209）。這種軍隊觀，與毛澤東式的「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恐怕也有不小的差別。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想強調三點。首先，俄國革命儘管有使用武力，但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進行普遍、全面的武裝鬥爭。其次，革命前的武裝鬥爭（不論規模大小）是一回事，革命後出現的內戰，乃至在內戰下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成形的「戰爭共產主義」則是另一回事，但不論是汪宏倫或朱元鴻的文章都沒有明確加以區分。最後，朱元鴻（2014: 137）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描繪為「有革命政黨的領導，能推動大潮、掀起內戰」，¹但主張建立革命組織與領導，不等於主張進行武裝鬥爭、發動內戰。不回歸歷史，細緻區辨革命史中的動力與反動、戰略與戰術、理論與實踐，是難以處理這類問題的。我最深的擔

1 其實，列寧是這樣界定「革命」的：「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學的和實際政治的主要標誌之一，就是積極、自動和有效地參加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制度建設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劇地增加起來」（Lenin, 1995a: 41）。

憂，就是這類關於「戰爭共產主義」的討論，隱約用線性敘事取代了具體的歷史分析。² 雖然朱元鴻(2014: 129)認為，我們應該深刻反省「冷戰如何滲透並結構著 1945-1990 年代」，但「戰爭共產主義」式的革命敘事，相當程度上恰恰是冷戰史觀的延續，不自覺地複製了冷戰結構所（從正面）正當化或（從反面）醜化的同一種革命敘事，而未能反省這種敘事方式的意識型態基礎。

朱元鴻(2014: 136)引用法國修正主義史家 François Furet 的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來批判布爾什維克革命，已有不少爭論的空間，儘管我有點懷疑朱元鴻是否真的同意該書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式結論（見朱元鴻 2014: 147）。³ Furet 畢竟有崇高的學術聲譽，未嘗不可引為己用，但引用俄羅斯右翼史家的暢銷書，將十月革命稱為「布爾什維克政變」，並謂其為記錄「導致災難與幻滅的政變歧途」的「春秋之筆」（朱元鴻 2014: 137），就難免有「拿來主義」之嫌了。⁴

其實，在冷戰格局下，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教科書詮釋」（借用俄國革命史研究者 Lars T. Lih 的說法），恰恰是將之視為一小群共產黨人的政變，如以下這段典型的描述：

-
- 2 再舉二例。朱元鴻(2014: 124-125)用了數百字的篇幅建立起「戰爭共產主義」的圖像，彷彿這種體制滴水不漏，堅如磐石。但讀者或許對以下事實更感興趣：早在 1920 年，托洛茨基便開始反省「戰爭共產主義」的錯誤，主張讓農民恢復經濟自由，「必須停止徵用穀物，必須鼓勵農民多種糧食、出售餘糧，還要使農民有利可圖」(Deutscher 1999: 544)，但中央委員會以 11 票對 4 票否決了他的提議。又，朱元鴻(2014: 125)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的翻版，此說亦不知根據何在。蘇聯 1922-1928 年的激烈黨內鬥爭，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傳統官僚統治與由下而上的革命間的衝突（結果是，除史達林之外，所有列寧時期的布爾什維克核心領導人先後被打成反對派、失去領導地位、開除黨籍、下獄槍斃，而要求恢復黨內民主及蘇維埃民主的托洛茨基則遭驅逐出國），這跟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背景可以等量齊觀嗎？而這又與「一國社會主義」論有何關係呢（比較 Trotsky 2008b；劉平梅 2005）？
- 3 例如這兩句：“The idea of another society has become almost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nd no one in the world today is offering any advice on the subject. Here we are, condemned to live in the world as it is” (Furet 1999: 502)。見 Bensaïd(1989)及 Wolfreys(2007)對 Furet 這類修正主義史學的討論。
- 4 這類調性的著作，英語世界難道還不夠多嗎？Richard Pipes (1990)、Orlando Figes (1997)，乃至譯成多國語言的《共產主義黑皮書》(*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1997) 等等，都是主流書市的寵兒。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一個規模甚小、沒有代表性、並帶有極權主義特色的政黨）奪取了政權，並因此背叛了十月革命。從此以後，就和1917年一樣，蘇聯的歷史便被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政治動力所決定，其中最具體的象徵就是其領導人列寧，這些政治動力包括壟斷性的政治、殘酷的戰術、意識型態的正統、綱領的教條主義、紀律嚴明的領導，以及集中化的官僚組織(Farber 1990: 10)。

然而，晚近諸多社會史及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已有力挑戰了「教科書詮釋」，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工人、農民、士兵自發組織的蘇維埃、工廠委員會、赤衛隊等遍地點燃烽火，催生了革命（見如 Lewin 1985; Kaiser 1987; Frankel et al. 1992; Suny 1994; Rabinowitch 2004; Murphy 2005; Wade 2005）。在重建歷史敘事時，不是不能捨上述研究而取 Andrei Zubov，但至少應該提出明確的取捨標準。

此外，簡短談談另一個與本書相關的理論問題。在抽象的理論層次上，鄭祖邦(2014)的文章從現代性的角度切入，試圖沿著「戰爭—國家」這條軸線將戰爭理論化，討論了馬基維利、克勞塞維茲、韋伯、傅柯等四位（最）重要的戰爭思想家。我認為，如果要說本書有什麼不完備之處，除了鄭祖邦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論工作外，還應該有一篇文章把歷史的視角再拉長些，從演化的角度探討戰爭在人類社會中的角色。若如此，將更能滿足編者為本書設定的目標，即「重新思考戰爭、認識戰爭、反省戰爭與各種形式的暴力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汪宏倫 2014a: 29），也更能讓讀者理解「跨學科的現代戰爭理論」的複雜面貌（鄭祖邦 2014: 90）。舉例來說，Jared Diamond(2014)和 Steven Pinker(2011)近來出版了兩部從演化觀點（特別是演化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輔以大量的人類學資料）探討人類戰爭與暴力的鉅作，並提出「人類的暴力與戰爭隨著現代性的開展而逐漸減少」的命題。這些作品已經引發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高度的興趣

與爭論（見如 *Sociology* 於 2013 年 47 卷 6 期規劃的書評論壇），但本書沒有任何文章觸及這些議題，略嫌可惜（國內學者的回應及反思見錢永祥 2012；錢永祥等 2012）。有鑑於「戰爭」（或更廣義的暴力）及其與人類合作、「人性」、現代性的關係已成爲當前國際前沿的「跨學科」研究主題（見如 Fry 2013；較早期的嘗試見 Sanderson 2001 的達爾文式衝突論），這或許表示國內社會科學界在「跨學科」的對話上仍有努力的空間。

最後，是一個社會理論方面的補注。鄭祖邦(2014: 76)和姚人多(2014: 341)都引用傅柯在《必須保衛社會》中對克勞塞維茲命題的翻轉。但我近來得知，David Macey 的英譯本恰好在這個地方犯了錯誤。⁵ 傅柯的原文是：Je crois en effet...que le principe selon lequel **la politique, c'est la guerre continuée par d'autres moyens** était un principe bien antérieur à Clausewitz (Foucault 1997: 41)；英譯是 I in fact think... that the principle that **war is a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was a principle that existed long before Clausewitz (Foucault 2003: 48)（粗體爲筆者所加）。也就是說，Macey 把「政治是戰爭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誤譯成「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了。有意思的是，鄭祖邦引用的雖然是英譯本，但其中譯文卻符合法文原意。⁶ 往後若有研究者需要引用這段譯文，應留意這個細節，不要被英譯誤導。

5 提供這個資訊的是 Graham Burchell，他是傅柯除了《必須保衛社會》以外所有法蘭西學院講座的英譯者。他在 2014 年 11 月 4 日透過「進步地理學」(Progressive Geographies) 這個網站發布一份他對《必須保衛社會》英譯本的評論。

6 鄭祖邦的譯文如下：「我認為，實際上，政治是戰爭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的原則比克勞塞維茲的原則早得多」(2014: 76)。

參考文獻

- 毛澤東(1991a)井岡山的鬥爭。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版，頁57-84。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1b)戰爭和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2版，頁541-557。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凡西(2003)毛澤東思想論稿。台北：連結雜誌社；香港：新苗出版社。
- 向青(1997)毛澤東是不是偉大的革命家。見向青、劉宇凡等，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國，頁335-349。香港：新苗。
- (2009)人類唯一的出路：社會主義。見 Ernest Mandel，馬克思主義入門。向青譯，2版，頁220-227。台北：連結雜誌社。
- 朱元鴻(2014)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見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97-155。台北：聯經。
- 汪宏倫(2014a)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見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34。台北：聯經。
- (2014b)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見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57-225。台北：聯經。
- 姚人多(2014)社會是戰爭的延續：日治時期以來台灣「國家的敵人」與「治安戲碼」的歷史考察。見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293-347。台北：聯經。
- 鄭祖邦(2014)戰爭與社會理論：一種現代性的視角。見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35-96。台北：聯經。
- 劉平梅(2005)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問題的爭論。見劉平梅，俄共（布）黨內爭論問題的歷史回顧，頁174-242。香港：馬克思主義研究促進會。
- 錢永祥(2012)「道德進步」：一本書與一種歷史觀。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40: 203-217。
- 錢永祥等(2012)人類歷史的確是一部道德進步的歷史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41: 205-272。
- Bensaïd, Daniel (1989) *Moi, la révolution*. Paris: Gallimard.
- Deutscher, Isaac (1999) 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王國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Diamond, Jared M. (2014) 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廖月娟譯。台北：時報文

化。

- Farber, Samuel (1990) *Before Stalin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iges, Orlando (1997)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 Foucault, Michel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 Gallimard/Seuil.
- Frankel, Edith Rogovin, Jonathan Frankel, and Baruch Knei-Paz, eds. (1992) *Revolution in Russia: Reassessments of 191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 Fry, Douglas P., ed. (2013) *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 The Convergence of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View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ret, François (1999)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Deborah Fur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iser, Daniel H., ed. (1987) *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7: The View from Be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nin, Vladimir (1995a) 局外人的意見。見列寧選集，第3卷，第3版，頁328-330。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5b) 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無產階級政黨的行動綱領草案）。見列寧選集，第3卷，第3版，頁37-71。北京：人民出版社。
- Lewin, Moshe (1985)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nterwar Russia*. London: Methuen.
- Meisner, Maurice (2012) 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溫洽溢譯。新北市：衛城出版。
- Murphy, Kevin (2005)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Pinker, Steven (2011)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 Pipes, Richard (1990)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Rabinowitch, Alexander (2004) *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 Sanderson, Stephen K. (2005)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ity: A Darwinian Conflict*

Perspec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uny, Ronald Grigor (1994) Revision and Retreat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917: Social History and Its Critics. *Russian Review* 53(2): 165-182.

Trotsky, Leon (2008a) 被背叛的革命。何偉舊譯。香港：馬克思主義研究促進會。
——(2008b) 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見鄭異凡編，托洛茨基讀本，頁 315-363。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Wade, Rex. A. (2005)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freys, Jim (2007) Twilight Revolution: François Furet and the Manufacturing of Consensus. Pp. 50-70 in *History and Revolution: Refuting Revisionism*, edited by Mike Haynes and Jim Wolfreys. London: Verso.

回應萬毓澤教授的評論（一）

朱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書評對於一本書的潛在讀者是個重要的媒介。因此不僅相對於作者與編者獲得批評的期待，更因為讀者的期待而成為學術期刊上受到重視的文類。準確的閱讀、指出一本書的獨特貢獻及其侷限，是一篇書評的基本要求。萬毓澤對於汪宏倫所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的書評頗令我感到驚訝。這本由十篇論文構成的書，書評者僅提及了其中三篇，其餘七篇論文則隻字未提，沒有任何梗概簡介。這對於所評的《戰爭與社會》一書當然十分不公平，對於「書評」這個文類被期待的任務也頗欠適當。萬毓澤「書評」的四分之三篇幅在討論本書中我的兩篇論文之一：〈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或許獨立成一篇專評此文的評論是更恰當的體裁。以下我僅就相關這一篇（簡稱〈百年〉）的批評部分提出回應。

有時，對於批評賜教的期待，遺憾地失落為面對粗糙閱讀的無奈。舉兩處為例（以下以標楷體引述萬毓澤評論文字）：

其一，萬文評及：朱元鴻(2014: 137)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描繪為「有革命政黨的領導，能推動大潮、掀起內戰」，但主張建立革命組織與領導，並不等於主張進行武裝鬥爭、發動內戰。

然而，「有革命政黨的領導，能推動大潮、掀起內戰」並不是作者朱元鴻描繪馬克思主義革命觀的語句，而是作者引述一位評審的文字，整個脈絡是回應這位評審描繪「革命」的圖像。頁135的引文有引號，註腳7有說明，一點不曾馬虎，卻全都被萬毓澤忽略！

其二，萬文評及：引用俄羅斯右翼史家的暢銷書，將十月革命稱為「布爾什維克政變」，並謂其為記錄「導致災難與幻滅的政變歧

途」的「春秋之筆」（朱元鴻 2014: 137），就難免有「拿來主義」之嫌了。

然而，頁 137 萬文指涉的這一句，作者開頭明明就指「這些史家」（亦即《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俄國史家）還原政變的歷史細節以及下春秋之筆的意圖。更且，萬文指涉的這段文字緊接著的下一段第一句即是作者說明：「這段討論的重點不在於說服接受任何一方的歷史判斷，而在於提醒有必要檢視我們所因襲的革命意識型態」。萬毓澤忽略作者在文中區辨地發聲，而將作者陳列的觀點之一粗糙地混淆成作者「拿來主義」的判斷。

回應粗糙閱讀的說明令人感到累贅；不過，萬文夾纏粗糙閱讀所提出的一些質疑，必須耐心奉答。

萬文以一半的篇幅試圖解除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模式武裝鬥爭之間的關連。他的質問如下：

1. 首先，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武裝鬥爭？
2. 這恰恰是許多反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對中共政權（武裝鬥爭模式）的批評。
3. 至於把毛澤東的武裝鬥爭追溯至列寧，也大有疑問。

萬毓澤表示他擔憂的是關於「戰爭共產主義」的討論隱約用線性敘事取代了具體的歷史分析。但他的閱讀忽略掉的是歷史分析而真正掛念的卻是「思想史」上責任關連與否的問題。例如他提議：「如果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又例如他在註腳 2 提及：「早在 1920 年，托洛茨基便開始反省『戰爭共產主義』的錯誤」。萬文引述許多列寧選集、托洛茨基讀本、毛澤東選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文獻。但議論效果若僅及於否認思想史上的關連，諸如指出「認為革命可以仰賴軍隊而實現的概念，遠超乎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想像」，則萬文不僅錯認〈百年〉分析的層次，也使其貢獻的思想史文獻顯得不相干。例如〈百年〉（頁 120-123）即指出：「馬克思未曾想像共產主義在

非洲部族社會的實現樣態，非洲卻在 1969-1975 年間相繼出現了一波馬列主義一黨專政的共產政權」；並對於提出的問題：「爲什麼 1990 年之前，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對非洲許多國家特別具有魅力？」給予歷史分析而非思想史上的關連與歸因。

歷史分析與思想史上的歸因或否認，這兩個層次不相對應的經典例子，我們該不陌生：馬克思曾否認在俄國那樣工業落後的農業國家可能領先出現社會主義革命並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於是馬克思不曾預見的 1917 年俄國革命，究竟是馬克思思想的驗證還是否認？

萬毓澤問：「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武裝鬥爭？」，關切著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自「戰爭共產主義」黷武形象的歸責中挽救出來。這個問題其實有個關鍵的教義問答：列寧的 *Guerrilla Warfare*。這份文獻的第一節要義是：馬克思主義不受限於任何一種鬥爭形式，馬克思主義積極看待運動中任何的鬥爭形式，包括當時參與者尚未知曉的鬥爭形式。第二節要義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是階級鬥爭而非社會和平，當尖銳的經濟與政治危機成熟爲直接內戰，亦即兩派人民之間的武裝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進行內戰。¹ 不知萬毓澤是否滿意這段列寧主持的教義問答？

〈百年〉對於「戰爭共產主義」的歷史分析，既無意在「馬克思主義」的正典中尋求歸責，思想詮釋的否認也就不那麼相干。給個比方：二十一世紀的南亞、中東與非洲，經常出現某些伊斯蘭群體在遂行殺戮或自殺攻擊時高呼 *Allahu Akbar!*（真主至大！）於是對此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立場：一種認爲這些群體所呼喊的「真主」跟他們一樣殘酷可怕，另一種則爭論這些伊斯蘭群體根本不能代表他們呼喊的「真主」。這兩種立場需要藉著經典的詮釋與判教來主張或否認。然而對於這個廣泛頻仍出現於二十一世紀的現象及其社會的歷史分析，

1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4th English Edition, Second Impressio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edited by Clemens Dutt. Vol. 11, pp. 213-2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Available from http://jessbcuzz.weebly.com/uploads/8/4/7/2/8472357/lenin_guerrilla_warfare.pdf (accessed 30 December 2014).

伊斯蘭經典的詮釋與判教就未必那麼相干。我也認為馬克思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未必認同，甚至未必預見亞、非、拉美以馬克思主義旗幟進行武裝鬥爭及其建立政權、表現「戰爭共產主義」的方式。然而思想上不能盡然歸責馬克思主義，並不影響界定二十世紀「戰爭共產主義」的特徵，對其在俄國、亞、非、拉美一些實例所實現的不同程度與形式做歷史的分析。在歷史（而非思想史）分析脈絡下，我不認為俄國革命的內戰與毛澤東的武裝鬥爭有著萬毓澤所強調不可比較的根本差異；而他稱「革命前的武裝鬥爭」與革命後的內戰以及「戰爭共產主義」是不同的二回事，在我看來，隨案例不同他強調的這個畫分本身就指涉不明（請試就中國革命界定一下這個畫分）。同樣的，〈百年〉比較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並非在教義理論或思想上尋求關連。毛澤東鬥爭劉鄧走資派未必需要參考史達林鬥爭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但兩者類似模式，都是黨的領袖以對革命傳統忠誠為由對黨內異己派系進行摧毀性的整肅。

萬毓澤將〈百年〉論及由 Andrei Zubov 集結 45 位史學家完成二卷各千頁於 2009 年俄文出版的《二十世紀俄國史》標籤為「俄羅斯右翼史家的暢銷書」，稱其為「冷戰格局下」的「教科書詮釋」，再另提出 7 本書單，據他稱「已有力挑戰了『教科書詮釋』」，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並要求我提出明確的取捨標準。明確的取捨標準不難說明，其實也就是反駁萬毓澤在這裡輕率亂貼的標籤。二卷 1900 頁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迄今仍只有俄文版，在俄文世界之外引起相當高的興趣，書評裡爭議與褒、貶皆有，但我還是第一次碰到有人把他們扣上「右翼史家」這頂帽子。Andrei Zubov 集結的 45 位史家，包括一些任教於費城、巴黎、威尼斯的學者，在這部鉅著裡可以說都是在後蘇聯時代為俄國讀者寫作的俄國史家，而不是英美學院裡人們多已熟悉立場光譜鮮明的蘇維埃研究學者（如萬文推薦書單上的幾位）。不論褒貶的評者大多同意，他們最重要的貢獻即是書寫了跟蘇聯時代「冷戰格局下」的「教科書詮釋」大為不同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若萬毓澤並非時代錯置地指他們書寫的是蘇

聯時代的教科書詮釋，而是指他們的歷史書寫屬於英美這一邊「冷戰格局下」的「教科書詮釋」，那麼不也厚誣了這些以俄文為俄國讀者書寫的史家？

冷戰格局養成簡化二分的習性。萬毓澤依據刻板立場而慣性、不由分說地將西方的蘇維埃研究文獻，分屬對立二邊的書架。他分類的邏輯，我熟悉但不同意。他推崇「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的著作，在我讀來，想要矯正的是 Moshe Lewin (2005) 所批評「將蘇維埃體系史達林化」的傾向，亦即放大史達林的國家官僚主義而遮蔽俄國革命的其他面向。在類似覺察下，Rex A. Wade (2005) 與 Kevin Murphy (2005) 運用後蘇聯開放的檔案所進行的研究，我認為都是很有價值的貢獻。但在這些著作裡我讀到的非如萬文歸結的簡單訊息：「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他們各有自成一格的論題：Wade 的標題是《俄國革命：1917》(*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明確地指 1918 年 1 月 6 日布爾什維克以武力解散民主選出的制憲會議是「革命的終結」。Murphy 的標題是《革命與反革命：莫斯科金屬工廠的階級鬥爭》(*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革命指的是持續 1917 年理想的工人階級鬥爭，反革命指的則是他們遭遇到的史達林主義的蘇維埃國家，以及由國家官僚體系發展出來對立於無產階級的剝削階級。在我讀來這些研究跟萬毓澤對立起來的那些書單，若非簡化的意識型態好惡，在歷史分析上沒有理由不能相容。當然，《二十世紀俄國史》不能侷限於理想革命的 1917 年，也不能只研究四個工廠的檔案，於是我們聽到許多萬文推薦書單上聽不到的聲音：俄國東正教會與穆斯林群體的境遇，1918-1922 年抵抗紅色恐怖的鬥爭，在「階級敵人」標籤下被消滅的教師、醫師、牧師、商人、前公務員、大學生以及一般平民的婦女兒童，在布爾什維克當權下 1921-1922 年與 1932-1933 年二度因政治局決策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飢荒，異議運動，流亡者的證詞，以及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Perestroika)。這些聲音與萬文推崇的那些歷史研究一樣嚴謹地出於檔

案文獻的證據。英美學界仍有些內部習慣以“comrade”彼此稱呼的圈子，慣用「修正主義」或「右翼」這類標籤來反對不符合他們意識型態的研究著作，但我認為這二方的學者其實都無法否定另一方的證據不是歷史的一部份。若萬毓澤覺得某些聲音對馬克思主義理想的「俄國革命」很冒犯，因此將這些學者標籤為「右翼史家」，那麼我得說，肅靜掉這些聲音，閉眼不讀另邊書架上的歷史證據，「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這麼簡化的結論，只能是個布爾什維克神話！

在寫作〈百年〉之時，很清楚意識到將引起某些讀者的不安，我設想的許多是我熟悉的朋友。因此萬毓澤讀了表達「不安」，我不意外。不過對於一些企圖簡化這篇論文的批評隱喻，例如「隱約用線性敘事取代了歷史分析」，我不接受。〈百年〉直到結論都是以歷史分析呈現二十世紀兩種革命模式的歷史消長及其背景條件的遞嬗，並無一句命題簡單設定兩模式之間的線性轉換。第七節末段更保留了最悲觀與最樂觀之間的所有可能性，畢竟未來只能降臨，不能預見。至於〈百年〉被指稱有將歷史複雜樣貌「削足適履」的危險，我一時不知如何感覺這似有深意的批評，還是等萬毓澤將他認為的天足帶出來讓大家瞧瞧，我再來檢討我這可能嫌小的鞋子還不遲。

參考文獻

Lewin, Moshe (2005)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Verso.

Murphy, Kevin (2005)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 New York: Berghahn.

Wade, Rex A. (2005)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回應萬毓澤教授的評論（二）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萬毓澤的這篇「非典型書評」（以下簡稱「萬文」），意外促發我們思考：書評是什麼？

作為學術期刊中的一種文類，書評不比正式論文，一來沒有固定寫作格式，二來也不被當成「業績」，僅可說是一種「學術服務」，評者幫大家讀書，把最新出版的專書評介給讀者。從這個角度看，萬毓澤願意花時間為《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寫書評，再怎麼說都是令人感心的事，至少表示這本書值得一評。不過，作為這本書的主編，讀到這樣一篇書評，心中難免有幾許失落。

書評儘管無固定格式，也沒有人規定書評應該怎麼寫，但讀者對書評總有期待。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期待從書評當中得知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在當前相關議題或領域的定位、以及對其學術貢獻的評價等。然而，目前這篇書評幾乎沒有述及整本書的全體內容，僅針對其中兩三篇（尤其集中在朱元鴻的論文）的部分論點針砭評論。因此，面對這樣的「書評」，讀者很容易覺得和一般的期待有不小落差。

固然，要評價一本非單一作者的專書，誠非易事。要評者全面地就每一篇文章深入評論，恐怕有點不切實際。但畢竟這不是一本隨機湊合的「會議論文集」，而是經過多年努力醞釀的集體創作（這是筆者在本書的〈序〉與〈導論〉中再三強調的），因此，針對這個集體努力的整體貢獻或缺失（而非僅針對個別論文）做出評價，應是讀者對書評的合理期待。如果書評者能勾勒全書架構與收錄各章的大致面貌，概述這些篇章乃至整本書在相關學術領域中的定位與貢獻（或侷限），無疑更能幫助讀者理解與評價這本書。

公允地說，萬文對此並非毫無著墨，只是極少。作者先在一開始定位本書是「台灣（甚至華語學界）第一本全面論述『戰爭與社會』各層次關係的專著，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到了文末的倒數第二段，他則指出本書的不完備之處，在於少了一篇從演化的角度來探討「戰爭與社會」的理論文章，並據此論斷國內社會科學界在「跨學科」的對話上仍有努力空間。前者是對本書的肯定，後者則是個具建設性的意見，筆者欣然接受之餘，也想補充幾句作為回應。

《戰爭與社會》背後有幾個容易看出的預設：第一，我們是放在「現代性」的脈絡下來談「戰爭與社會」，對前現代的戰爭，本書基本上未處理，遑論把時間軸拉長到整個人類的演化史。事實上，萬文所引用的筆者〈導論〉文字已經清楚地說明本書預設的目標範圍，即「重新思考戰爭、認識戰爭、反省戰爭與各種形式的暴力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¹。第二，儘管筆者的〈導論〉是從鄂蘭(Hannah Arendt)的《論暴力》(*On Revolution*)入手來展開整體論證，但我們的焦點集中在（集體）暴力的某種極端形式，也就是戰爭；如果把焦點放寬到暴力全體，那麼需要處理的議題將會更加繁複。這不但已非這本略顯厚重的專書所能承載，也將模糊原本想要凸顯的焦點。第三，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現象，戰爭在不同學科有各種各樣探討方式與研究傳統，例如政治學與歷史學界處理戰爭議題甚多，各有其關懷旨趣。這本書仿效歷史社會學者 Theda Skocpol，呼籲「把戰爭帶回來」，是對社會學界喊話，主要設定的對象是那些傾向於忽略戰爭議題、或尚缺乏適當理論概念工具的人文與社會學界。即使如此，本書仍隱含著

1 一個值得一提的花絮是，筆者對萬文所提到的 Steven Pinker 與錢永祥等人的著作，其實並不陌生，亦曾有對話機緣。錢永祥針對 Pinker 的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所寫的深度書評〈「道德進步」：一本書與一種歷史觀〉一文出版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在 2012 年 5 月 5 日舉辦了一場論壇，針對 Pinker 的書與錢永祥的文章進一步對話討論。筆者躬逢其盛，並曾於會中公開發言質疑「人類暴力與戰爭隨著現代性的開展而逐漸減少」的命題。當時《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的主編謝世民邀請筆者將當時發言寫成評論，筆者後來因故未能成稿。如今思之，不無遺憾。《戰爭與社會》預設的出發點，恰恰是站在 Pinker 與錢永祥等人的對立面，而「人類暴力與戰爭究竟隨著現代性的開展而增加或減少」，的確是個耐人尋味的重要課題，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跨學科對話的努力，例如其中兩篇文章便是來自歷史學者與精神分析學者的貢獻。這些跨學科的努力本應被看到，卻因為萬文未能描繪全書概貌而遭到忽視。再者，這本書既然方是起步，必然無法從一開始就面面俱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遙想幾年前筆者著手籌劃此書時，便邀請曾有師生之緣的萬毓澤君參與，惜未獲首肯。今日毓澤君藉由書評指出本書之不足與尚待努力之處，筆者非但不以為忤，反而頗感振奮。如筆者在〈導論〉中所說，「戰爭與社會」是個方興未艾的領域，值得更多學者重視參與，毓澤君盍興乎來？

以上是作為本書主編所做的回應。作為本書其中一篇的作者，筆者援引朱元鴻的「戰爭共產主義」概念，萬文不以為然，但其批評主要是集中在朱元鴻的論文上。對於「削足適履」、「線性敘事」等指控，朱元鴻已有回應。筆者此處既無需對號入座，更不必越俎代庖，只能說，這些都是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學者經常面對的批評，恐怕將會永無休止地爭辯下去²。

最後，回到「書評是什麼？」的問題。書評不僅是「學術服務」，也是一種對話。萬文雖非典型書評，但無疑在諸多議題與面向上都開啓了有趣的深度對話空間。如果藉由這本書所帶出的討論能吸引更多同儕加入對話，甚而投身研究，則當初編纂此書的目的，亦可謂庶幾近矣。

2 追根究柢，這背後牽涉到的其實還是個方法論上的老問題，也就是紛然雜陳的歷史現象有無可能透過某種特定的敘事框架或規律來加以理解（或這樣的理解是否恰當），或是這些企圖化簡取繁的理論概念是否能夠掌握高度複雜的歷史現實。關於中國的「戰爭共產主義」與「戰爭之框」，筆者另撰有〈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即將刊登於《文化研究》），其中分析是否允當，讀者自可參考評斷。